

何 平 著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商务印书馆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何 平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何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6566 - 5

I. 西… II. 何… III. 历史编纂学 - 历史 - 西方国家
IV. K062 - 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3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资金资助

XĪFĀNG LÌSHǐ BIĀNZUǎN XUÉSHǐ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何 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566 - 5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½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的史学	10
一、希腊史学	11
二、希腊化时期和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史学	18
三、古代罗马的史学	23
第二章 中世纪的历史编撰	31
一、基督教历史观念和教会史学	32
二、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历史编撰	37
三、中世纪编年史的发展	49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57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58
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文主义史学	69
第四章 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史学	75
一、新旧教之争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	75
二、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期间欧洲其他国家的史学	80
三、博学派的史料考订和文献编撰	85
四、博绪埃	92
五、十七世纪历史认识论的变革	94

第五章 十八世纪:史学观念的更新	97
一、历史进步观念	97
二、理性主义史学	106
第六章 十八世纪的历史哲学	119
一、维科	119
二、孟德斯鸠	122
三、杜谷	125
四、孔多塞	129
五、康德	133
结语	138
第七章 十九世纪史学: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政治革命	141
一、德国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史学	143
二、法国的浪漫主义史学	152
三、英国的浪漫主义流派	155
四、英国史学:宪政、革命及其他	159
五、19 世纪法国史学:诠释法国大革命	170
第八章 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与客观史学	176
一、柏林大学	177
二、朗克与客观主义史学	181
三、朗克学派与普鲁士学派	186
四、实证主义史学	193
第九章 十九世纪史学:专门史研究	205
一、制度史研究	205
二、中世纪欧洲城市起源研究	212
三、古代埃及、近东、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历史研究	214

第十章 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史编纂	225
一、早期经济史研究	225
二、德国的经济史学派	229
三、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史编纂	236
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史	243
第十一章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的形成	250
一、马克思历史观念的三大来源	252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260
三、结语	267
第十二章 美国史学的发展	271
一、美国的早期史学	271
二、十九世纪:欧洲史学观念影响下的历史写作	274
三、美国本土的史学观念和流派的创始	279
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	282
第十三章 批判历史哲学: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历史 客观性的限度	286
一、对客观史学观念的解构	288
二、对历史事实和历史客观性的再探讨	293
第十四章 二十世纪:历史观念和写作范式的变迁	300
一、文明形态论	301
二、现代化历史研究	305
三、法国年鉴学派	312
四、历史社会学	324
五、历史人类学	330
六、后年鉴史学	332

第十五章 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解释的探讨	337
一、历史思维中的概念	338
二、一般概念在历史解释中的意义	340
三、作为历史解释的叙事情节	346
第十六章 二十世纪下半叶:史学理论的后现代化	352
一、语义学转向的背景	353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视野下的历史著述及其文化	361
三、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理论创新	369
四、诠释学与文献研究	383
第十七章 新的历史编纂理论和方法	389
一、比较史学研究	389
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反思	396
三、全球化对传统历史编纂主体——国家及其文化的影响	401
第十八章 全球化时代的新历史编纂模式	410
一、全球史的编纂模式	412
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及其影响	415
三、全球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话语特征	418
参考文献	423
后记	431

前 言

英国历史学家史丹福(M. Stanford)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y):1)描述类型的史学史,它描述讲解历史写作程序和方法等,如英国学者马维克(Marwick)的《历史的性质》(*The Nature of History*);2)史书类型的史学史,它追述有史以来历史撰述的方式以及重要的著作和作者等等;3)分析类型或批判类型的史学史,他探索撰史时产生的观念性或哲学性问题。我们的这本历史编纂学史显然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涉及了。

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据认为是在三个学派的影响下诞生的,即意大利克罗齐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学派。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使历史学家们去思考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学派都看到历史上的历史著述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当代社会问题做出回答,历史探讨和历史写作表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20世纪初兴起的“批判历史哲学流派”突出地表现了西方历史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界对历史作为一门知识领域的发展形态的高度关注。早期几本重要的通史性史学史著作都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如福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1913年)、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班兹的《历史著作史》(1937年)、邵特维尔的《史学史》(1939年)和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年)。

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普遍成为各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历史理论和历史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巨大影响就是一例。学术界和社会对历史写作的意义和性质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和形式的关注增强。专门的历史理论研究刊物《历史

2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与理论》于1960年创刊,1980年“史学史与理论国际委员会”成立。20世纪下半叶出版了更多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例如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7年)、布莱萨赫的《历史编纂学史——古代、中世纪与近代》(1985年)、伊格尔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80年)、《欧洲史学新动向》(1989年)和《二十世纪历史编纂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1997年)以及波普《历史主义的贫乏》、亨佩尔的《一般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1973年)、安格尔斯密特的《历史再现》(1988年)等。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创新理论的那些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列维·斯特劳斯、布劳代尔、福科、德里达和拉康等不仅在史学界也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内影响深远。20世纪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也表现在史学流派和思潮跌宕起伏,更换极快。很少有哪个世纪如20世纪那样看到如此多的流派:批判历史哲学、分析历史哲学、新史学、年鉴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出现。

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美国史家杜威曾经对这种重写历史的现象写道:“随着文化的改变,在这种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要改变,研究、评价和整理史料的出发点必然要产生,于是,历史也就要重新改写。过去没有重视的材料现在成了论据,因为新的观点要求解决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要求有新的事实材料来进行验证。”^①可以看出,西方史学的概念体系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西方史学发展的生命就在于它不断地推陈出新。然而,西方史学的许多核心概念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剑桥历史学家彼德·伯克曾对西方史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他认为西方历史编纂学是以“线性历史观”、“强烈的历史感”、关注意释因果关系、客观性观念、注重定量分析以及特有的时空观念等为特征的。

^① 杜威,《自由与文化》,纽约:1939年版,第45页,转引自康恩著,乔工、叶文雄等译:《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36页。

西方史学从修昔底德到朗克,似乎都分享三项基本观念:第一,史学写作所描述的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或存在的状况;第二,人类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意图,历史学家通过理解这些意图能够重建一个多少真实的历史故事;第三,认为历史演化的时间是一维的,后来的事件是由线形序列中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①

历史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学科是由于朗克实证史学方法的传播。19世纪以朗克的“科学的”历史为标志,古老的文史一家的传统断裂了,历史写作中的文学因素被忽视了。尽管实际上,在朗克的实证史学中也包含文学的想象。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似乎消解了与修辞学和文学的两千年来的联系。19世纪末,当历史学首先在西方尤其是在德国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时,西方史学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不仅能评论自身与先前文明的关系,也能评论与西方文明在时空相异的其他文明。19世纪西方许多伟大的史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获得的地位不依赖于他们的理论或支撑其概括的材料的性质,而依赖于他们阐释那个时代为止的历史的连贯性的富有启迪的洞察,所以即使发现了新的理论或材料,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历史地位。

19和20世纪有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对西方史学范式的兴趣,其他非欧民族史学传统也参与形成全球性的史学实践。在今天,全球史学实践日益接近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在历史学领域内的学术霸权的减弱。历史知识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档案的解禁和开放使我们能阅读利用更多的资料,对历史的理解已远为复杂了。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解释近现代历史学关于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和意义时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行为,它通过考证文献,对证据进行解释,达到人类自我认识的

^① 参见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目的。许多历史家还都认为历史学应当是一门科学。^①三十年后,这种历史观念已引起很大争议。

20 世纪上半叶对朗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反思中,许多历史学家认识到研究伟人和宏大事件的历史著述的局限,因为它忽视了伟大任务和宏大事件在其中起作用的更广阔的语境,他们呼唤能更为详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史学。于是,历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转向社会科学概念。在法国和美国,朗克和孔德所强化的实证主义潮流进一步扩展成为从叙述事件史到社会科学定向的研究模式。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概念影响的研究范式到年鉴学派,都强调揭示各种社会结构和历史演变(地理的、气候的、人口的、政治的)模式。二战结束后,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交史、政治史被社会史压制了。

20 世纪 40 到 60 年代,分析历史哲学家澄清了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学可能被视为一种科学。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起源于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发展成包括维也纳学派、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及以蒯因为代表的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所谓“分析哲学”,它十分注意语义分析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这些学者相信两千年来科学已取得很大进步的时刻,哲学却原地循环。分析哲学家批评旧的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哲学试图建立一套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缺乏经验基础,是靠思辨臆想出来。真正的知识体系,在他们看来,是以源于经验的命题为基础,通过逻辑推导构筑起来的。科学上有意义的命题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或者是能被逻辑分析论证的命题。形而上学的命题则是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逻辑分析论证的伪命题。他们主张哲学应当以语言分析和语言批判为己任。^②

① 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R. Ci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0-11 页。

② 张庆雄、周林东、徐英瑾著:《20 世纪英美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7-93 页。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许多历史学家满怀信心,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基于对人类生活经验的逻辑分析的类似社会科学的学科。当时的历史学因此转向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去寻找研究的概念和视角,历史编纂的重心放在宏观的历史潮流和非个人的社会和历史演化的结构。许多历史家相信历史编纂学已经克服了从修昔底德到朗克的那种把叙事的焦点集中于伟大的人物、伟人的思想及其所从事的事业的倾向。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生活前此所依赖的那些乐观假设、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都受到挑战。历史学编纂的内容从精英转到普通民众,从宏观历史转到微观史学,从关注巨大的社会和历史演变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真实层面,从社会史转到文化史。历史编纂者们于是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 and 心理学甚至文学的概念和方法论。以前历史写作所依赖的那些理论前提在 70 年代到 90 年代遭到从法国到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包括罗兰·巴特、海登·怀特、迈克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人的严厉批判和清洗。过去二三十年间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术研究,并能因此而重建历史真实的过去的信念已被更为精深的见解所取代。

20 世纪后半叶,经济增长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入历史意识,社会进步导致朝向完美社会的启蒙观念动摇了。东亚的崛起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和技术开发的中心之一,挑战了西方文明及其所首创的现代性的独特性。18 世纪启蒙哲学家曾力图把人类从虚幻的神学思维中解放出来,他们相信理性和对科学的信仰是解放人类的工具,也是理解历史的重要概念框架。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对理性和科学的信仰是控制和操纵人类的一种工具。

传统史学所构筑的宏伟叙事还在更深的思维模式层次——时间观念上受到挑战。牛顿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宇宙客观存在的两大特性,康德把时空视为是思想赖以整理经验现象的普遍思维范畴,布罗代尔等法国年鉴学派史家从历史演变中抽象出三种不同时段。在布罗代尔的视野中,历史时间是随它

所研究的主题而以不同的速度和节奏而不同。现代化理论也把现代世界历史看作是“历史的终结”。随着传统时间观念的解构,历史编纂主题也开始片段化。

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受到进一步挑战。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的一个信念就是在思想者之外存在一个客体,或者说存在一个与思想家的主观性并无关联的客观真理,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就已有意识地把历史和神话区别开来,并力求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一番真实可信的描述。20世纪中叶后,认为历史学研究中并没有客体,史学与文学的联系比史学与科学的联系更紧密,历史研究没有客观性的看法日益流行。

后现代主义相信历史学家是自己的思想世界中的囚犯,他的思维和感受被他使用的语言和范畴所制约,语言文本构成了历史学家的现实,但文本并不指向外在世界,它们也可以被以多种形式解读。在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看来,文化也是一种文本,文本并不是必须具有一种书面的或言辞的形式。罗兰·巴特和怀特等认为历史著述类似文学写作,必须从文学的范畴来加以评判,他们否定了历史成为专业以来历史家从事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信念,也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总结并为西方思想家所接受的历史叙事与小说虚构的区别。新历史主义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等强调历史著述的文学性,他们认为自古以来许多历史家都认为他们是在道德说教,当代学术研究进一步揭示历史学家总要使用比喻的语言来创造历史形象。朗克实证史学和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说历史叙述之外有客观实在,至少历史叙述与真实的历史过去有一种特殊关系,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观念。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的性质远比上述更为复杂,他相信任何历史叙述都渗透了意识形态或者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因为过去的事件是不确定的,当历史学家把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编纂起来,并以某种方式进行说明时,就会表现出某种政治或伦理的倾向。另外,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历史主义的,无论历史叙事者怎样试图自觉达到客观和以证据文献为基础,他的历史叙事都处

在人类文化的一个特定的时代中。一切历史的再现都包含了历史主义的成分。过去被以现在的眼光审视,反过来也就阐明了当前的由来。

历史写作也被认为是诠释性的。历史学家把一系列彼此联系并不明确的事件编织成一个叙事,并赋予一种意义模式。历史学家在编纂的过程中多是按照某种情节模式或思维逻辑来进行的,其实质是透过利用文本来论述某个主题,因而历史学所产生的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知识。怀特认为历史写作和历史著作不是对过去真实的一种模仿或反映,而是一种符号式的和比喻式的说明。^①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著述包含特定作者叙述过去的方式,历史论著的要素由大量的文本资料、某种解读或诠释文本的策略所构成。^②历史研究中因此存在诗学的一面,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学家,或是实证的历史学家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思辨历史学家那里,它得到系统和明白的阐释;而在正统的历史学家,如朗克和托克维尔那里,却是暗含的。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及相应的语言规则构成一部史学作品的“元史学”基础。上述这些观点当然有些偏颇,因为它否认历史也是由历史学家所发现和收集的关于过去的许多可靠信息所构成,并且否认历史是过去的确发生过的事件,但这些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写作的性质远比朗克想象的更为复杂。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西方史学,并与许多史学潮流的兴起和衰落有紧密联系。20世纪法国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使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的重要性,并看到文化对于理解政治社会行为的重要性。在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受到马克思分析方法影响的著述以及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强调阶级斗争与经济因素的做法便被弗朗索瓦·福莱(Francois Furet)和威廉·西威尔(William Sewell)关注文化、语言、符号和礼仪的写作模式所取代。文化研究也后现代

①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述现历史》(H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57、78页。

② 张京媛译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66页。

化了。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三代学者所做的开拓性和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使我们再也不是对西方史学一知半解。这些学者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有张芝联、何兆武、陈启能、谭英华、郭圣铭、朱环和于沛,还有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史学者的张广智教授、杨豫、郭小凌教授,以及以陈新为代表的年青一代的学者。

这本书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写成的。书中不少章节的内容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在攻读西方史学史研究生学位的学习笔记和后来留校任教的讲课笔记。在其后20年间,我利用在英国留学的机会,访问了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著名大学,实地感知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状况。在牛津的长期留学生活中,我深受英国史学注重文本分析和语言清晰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逻辑实证主义倾向的影响。对意大利主要城市,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造访使我了解了古代罗马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家如马基雅弗利,以及后来的维科和克罗齐生活的那个地理和历史人文环境。我也有幸成为巴黎高师的访问教授,多少次我坐在巴黎高师泉水滴涌的庭院里,思考何以小小的高师出现了那么多闻名世界的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马克·布洛赫、列维·斯特劳斯、布劳代尔、拉康、福柯、德里达。这些现代西方史学的大师的足迹,我似乎仍能够在高师的庭院里感知。就在巴黎高师学访期间,我完成了本书法国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那些章节,19世纪法国革命史学的章节是在已故法国大革命史家索布尔的家里写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坐在索布尔曾多年伏案写作过的那个书桌前阅读和撰写,索布尔生前收藏的书籍仍摆放在书桌旁边的书架上。

我曾为自己撰写这本书确定了更高的目标,同时采用社会科学方式和文化史学的方法,但我最终未能做到。传统史学史著作罗列名著和影响深远的史家观念。晚近的许多西方史学史论著不再把重点放在著名的史学家和名著上,转而研究史学赖以源出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思想的背景,并采用计量史学

和新史学的方法。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传统史学史所关注的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思想观点往往超前于他们那个时代,例如伏尔泰的文化史和文明史的编撰理念和实践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为广大史家所接受,并成为主流史学编撰潮流之一。文化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注意那些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是荒谬的众多著作,例如了解中世纪的历史著述状况,我们不能忽视大量的那些充斥着有关神迹、上帝的计划、圣徒的生平、世界的起源和人类历史演化的神学描述的历史书。文化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收集和 research 特定时代的所有历史著述,并在对资料文本的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有关那个时代历史写作的概貌。

我的这本书是为学生而写的,因此我还是把重点放在评介著名的史家、名著和理论流派,以使学生在篇幅不多的书中尽可能了解那些帮助形成今天历史研究范式的学者、他们的写作方法、概念和理论观点。也许有人会批评这本书只关注那些做出“重大贡献”和提出新理论的名家,仍然是在传统史学的框架内构思。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即归根结底,我们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它的用处就在于帮助我们形成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了解史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前沿。当然,这本书对于更广大的读者——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和有大学学历的知识阶层来说,它也有助于他们了解西方人是如何对他们的历史进行研究和反思的。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的史学

人类用文字记载自己过去的活动,早在希腊史学诞生之前很久就在埃及、巴比伦、迦太基、波斯、印度和中国出现了。北非、中近东诸文明的历史记述活动为希腊史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埃及文明的最遥远年代起,就有撰写简单的年代记的习惯,僧侣们把法老的姓名、即位的年月及事迹镌刻在花岗岩或其他纪念物上。现已发现的较早的年代记是第五王朝(公元前 2750 - 前 2625)时期编写的包含史前到第五王朝诸王的年代记片断。埃及的历史资料除记载王朝统治的更迭和大事件的铭文外,尚有法老的文书、神庙的档案、土地税收人口登记和各种法律诉讼记录等等,然而这些记录大部分都是写在草纸或皮革上,它们随时间而湮灭。直到十八王朝(公元前 1580 - 前 1350)才有关于军事远征和对外关系的大量记载。

第一个创造历史文献的是亚述人。国王们为新修的建筑刻下铭文。大约在公元前 1100 年以后,这些铭文由单纯歌颂帝王业绩逐渐转变为历史记述。国王的功绩被全面记载下来,事件被按时间先后排列起来,或按战役的顺序叙述,并且对重大战役下很大功夫单独描写。新巴比伦帝国时期(公元前 626 - 前 538)编写了一部《巴比伦编年史》,是用楔形文字写的一部最好的史书。

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那些历史记事活动出现若干世纪以后,希伯来人也在后来称之为《旧约》的那些文本中,记载下了与希伯来民族有关的重大事件。公元前 1000 年就有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说作为现在的《旧约》书中有关历史诸卷的基础,后来的各派先知不断增补、修订。腓尼基人也形成了由官方记载,编纂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的习惯。国王的姓名、在位年代、城市年代记和其他重大事件的记载多保存在神庙中。汉尼拔和马其顿王腓力所签的条约刻在迦